

刘心武

名

城

LIU
XIN
WU

侃作

KAN
BEI
JING

家

名

北京

名



刘心武

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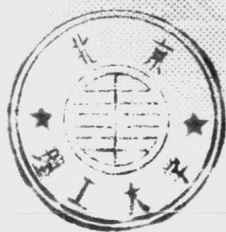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

刘心武

侃

北京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98885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心武侃北京/刘心武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0.10

(名家名作名城)

ISBN 7-5321-2150-X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1960 号

策 划: 郑宗培 魏心宏 袁银昌

责任编辑: 修晓林

设 计: 袁银昌

刘心武侃北京

刘心武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i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界龙印刷装订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161,000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1-2150-X/I·1741 定价: 28.00 元

刘心武 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。1950年随父母到北京，从此定居北京。1961年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十三中任教。曾参与《十月》创刊工作。1987至1989年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。1990年后专门从事写作。**1958**年第一次发表文章，至1998年底，已在海内外出版个人专著80余种，另在1993年出版《刘心武文集》8卷，以及散文未收集作品共约700万字。1977年11月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发表《班主任》引起轰动，被认为是“文革”结束后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。中篇小说代表作有《如意》、《立体交叉桥》、《小墩子》等；长篇小说有“三楼系列”：《钟鼓楼》、《四牌楼》、《栖凤楼》及《风过耳》等。《钟鼓楼》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；《四牌楼》获上海市第二届优秀长篇小说奖。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纪实小说《5·19长镜头》、《公共汽车咏叹调》又一次引出轰动，并在《收获》杂志开辟《私人照相簿》专栏两年之久。九十年代后发表大量随笔，已有二十多本集子在海内外出版。九十年代后又致力于《红楼梦》研究，除发表“红”学论文外，已有探佚成果《秦可卿之死》、《贾元春之死》、《妙玉之死》等三部中篇小说。若干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西班牙、瑞典等文字在海外出版，被多家欧、美《世界名人录》收为辞条。**现**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

作家简介

北京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，但如要正确把握与反映其风貌、神韵，却非易事。作为一位祖籍四川的作家，刘心武却有幸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连续50余年，观察感受北京这座古都的风云变幻、喜怒哀乐，以至将其生命与这座城市交融在了一起。本书不仅有作者深情侃说北京的文字：有以北京那虽已消失，却精神不死的隆福寺为背景的，令人神伤凝思的爱情故事；有以北京至今引为自豪的，富于野趣的城特殊角度“偷窥”的新北京倩影。书中还穿插着作者自绘的若干水彩画，这些画幅绝大多数都是头一回向读者展示，观看它们的意义不在用专业标准衡量其画技，而在于从中可以窥见作者面对北京的景物与市民时，那内心的隐秘情愫。



编者的话

008 抚摸北京

041 蓝夜叉 (中篇小说)

081 银锭观山 (中篇小说)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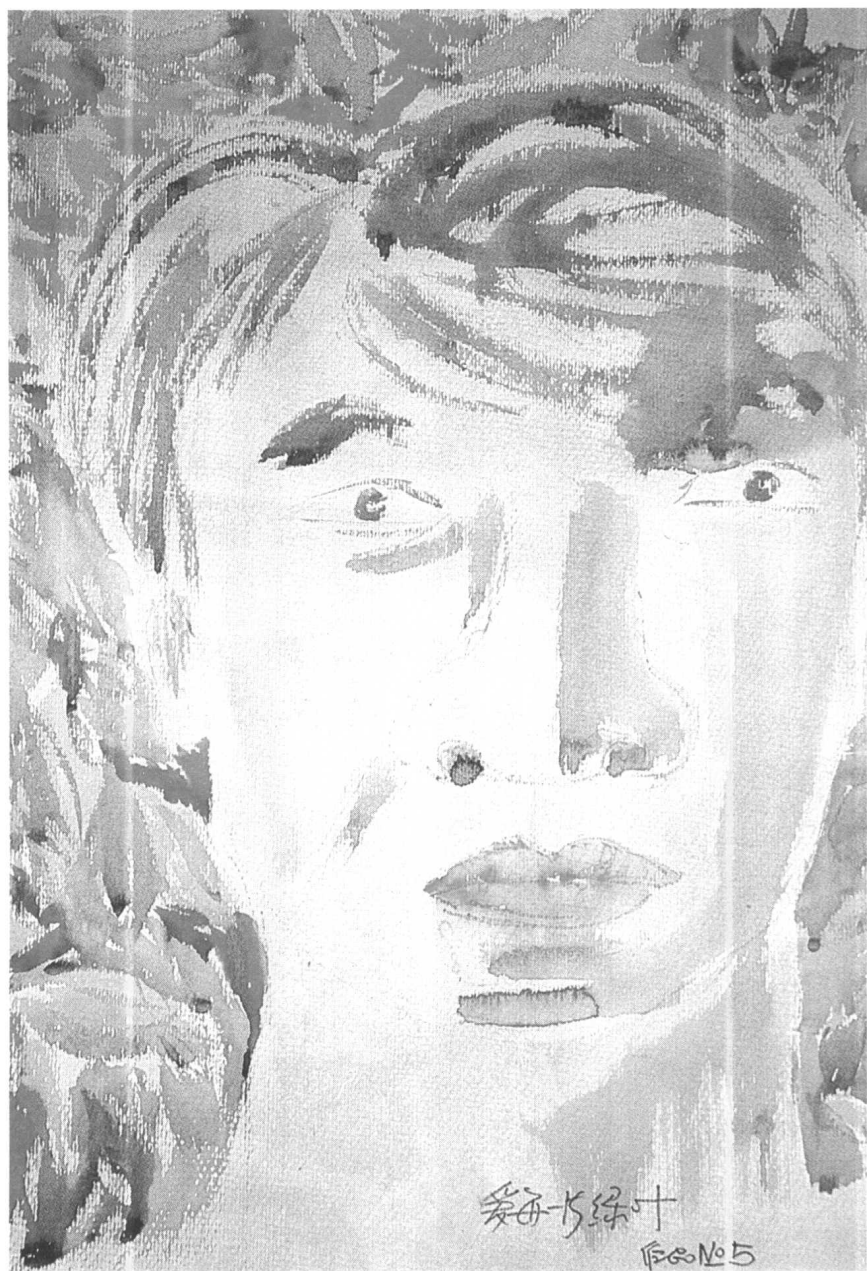
174 作家创作简历

176 海外对刘心武评价资料

177 后记

原 书 缺 页

原 书 缺 页



刘心武自画像

抚摸北京

壹

侃北京，有多种侃法。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说起，缕叙城市沿革变迁，是讲史的侃法；从故宫天坛、胡同四合院讲起，是梳理人文景观的侃法；从“五·四”运动的“红楼”，一路说到1949年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，以至改革、开放后城

黄瓦红墙，是北京古都风貌最抢眼的色彩。在秋日蓝空的映照下，尤其能牵动出人们幽深的思绪。

序言



区天际轮廓线的跃动，是政治角度的侃法；把烤鸭子、涮羊肉、冰糖葫芦、景泰蓝、京剧、大鼓书、抖空竹、摔跤中幡……一一道来，是强调民俗风情的侃法；从北京话与普通话的不同说及北京人的性格共性，也许可以构成更具学术性的侃法；还可以设计出若干更独特以至更令人有匪夷所思之叹的怪侃法；但我现在却打算只从我个人半个世纪的生命体验，这一单纯的角度，来侃北京。

貳

我出生在四川成都，3岁后住在重庆，8岁那年，跟随父母从重庆迁到北京，由那以后，便一直定居北京，从童年，经历少年、青年、壮年时期，直到如今渐入老年，已达半个世纪之久，所以，我虽不是“土生”于北京，却可称得上是“土长”在北京了。



关于我自称“定居北京半个世纪”这一点，曾引出过质疑，比如一位海外的汉学家就问过我：你“文革”中没有“上山下乡”吗？没有“下放锻炼”过吗？没有去过“五·七干校”吗？他知道我出生于1942年，“文革”爆发的1966年，该是24岁，按19岁上大学算，如果是五年的学制，



笔者是1950年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的。1960年父母离开北京去了张家口，笔者仍留在北京。弹指间，笔者定居北京已达半个世纪。左照：父亲刘天演和笔者摄于颐和园西堤。

右照：母亲王永桃和笔者摄于北海五龙亭。



正阳门箭楼

我那时应该大学快毕业而尚未能分配工作，在卷入“红卫兵”运动之后，应该是有一段离开北京的“上山下乡”或“下放锻炼”的经历，至少得一两年；如果我在1966年以前已然分配了工作，则又难免有下放到外地“五·七干校”的遭遇；因此，我的“定居北京”，怎么说也该是断续的。可是，我的实际情况是，户口自1950年后从未迁离过北京，1966年以前既没有到外地上大学，也没有被派往外地参加“四清”，1966年后也没有上山下乡或下部队或到“五·七干校”锻炼，1978年改革、开放以后，虽年年都有国内或海外之游，但最长也都不足三个月；在我8岁后的生命史上，迄今为止，没有连续三个月双脚不踩北京地皮的情况出现过。这就使得我，对北京从此刻前溯的，差一点点就满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，具有最充分的“现场感”，我的观察体验，身历憬悟，一旦用文字“侃”出，也许，其“一手”的资料价值，总还不可抹煞吧。

叁

1949年以前，我父亲是重庆海关的职员，我家住在长江南岸，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坐“海关划子”（一种小的机动船）摆渡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她嫌我在家淘气，而那时附近并没有托儿所，只有一座海关子弟小学，于是她将那所小学权当托儿所，把我送去上了一年级，那是1947年，我只有5岁。父亲在国民党的海关里，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过从甚密，对他们很起了些掩护作用，1949年10月1日，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成立时，重庆还没有解放，父亲跟地下党一起，为迎接解放，做了大量保存海关物资的工作——我曾以此为素材，拓展想象，写过一个中篇小说《嘉陵江流进血管》——1949年年底解放军来到后，重庆海关成立接收小组，成员除了军代表和公开了身份的地下党员以外，还特别吸收了我父亲参加；那时，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，立即调用重庆海关的原地下党员到任，而他们又特别推荐了我父亲，去担任新海关统计处的副处长；于是，1950年初，父亲以兴奋的心情，携母亲和我的小哥、阿姐和我，先乘江轮到武汉，再乘火车抵达北京。到了北京，暂时把我们家安顿在东交民巷的海关机关的一座洋房的地下室里。我因为上学早，因此也许比同龄的孩子在感知身外世事上较为敏锐。刚到北京时，正值寒冷的冬日，呆在屋子里，也仍然冻得够呛，偶然跟着大人外出走走，只觉得街道上一片灰蒙蒙的景象，对比于重庆南岸四季有绿的风光，真是不喜欢。那时小哥、阿姐和我一时都未能解决转学续读的问题，窝在家中，一起嬉闹时，常常故意学着父亲的腔调说：“北京好着呢！”以为讽刺。

父亲和母亲在重庆带着我们奔赴北京时，的确频频地向我们宣谕北京的佳妙。他们虽祖籍四川，很小便随我爷爷到了北京，童年、少年



童年时代的笔者，在天安门前的石狮下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

笔者父母的童年、青年时代是在北京北城净土寺胡同的这座大宅院里度过的。1956年他们重访旧迹拍下了这张院门的照片。他们向笔者讲述过很多发生在这个院门内的故事。八十年代末笔者迁至离这条胡同不远的安定门，曾特意去“接图索骥”，结果发现面目全非。城市的往事应储留在动情的故事中，而不必苦苦地去寻踪觅迹。

和青年时代，都是在北京度过的，婚后才离开北京；他们壮年时得以回来，大有重归故里之感；我们一时却难以共鸣。记得母亲曾带我去前门某胡同，一座大四合院里，探视某昔年的故旧，那破败的门楣，纸制的窗帘，烧煤球用以取暖的，比我身体还胖大的“花盆炉子”，以及一节套一节弯出窗外去的黑铁皮烟筒，还有大砖炕上半身不遂的，戴着旧式黑绒帽，喉咙里呼噜呼噜总涌着粘痰的胖老太太，炕头放着的齐我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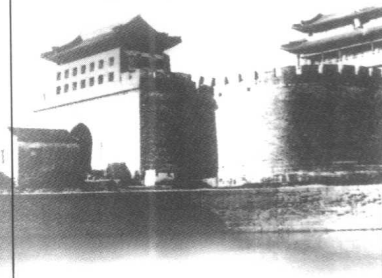


腿根高的，长脖细腰的黄铜痰盂，连带着弥散在他们屋子里的羊肉茴香馅饺子的气味，都铭心刻骨地让我感到与之格格不入。那该是旧北京的残存景象之一。没过多久，海关总署为我家安排了正式宿舍，在钱粮胡同35号。现在那条胡同的外观变化并不很大。但我们住过的那个院子，经重新编排门牌号码，已不是35号了。那是一个不仅有外院，有垂花门通进去的，院心栽有四株西府海棠的漂亮内院，而且还有后院、侧院和花园的，很大的一座宅院。据说汉奸当权的敌伪时期，那座院子一度是日本鬼子的特务机

关,我家所入住的那套住房里,便留下了明显的“和式”格局。我随父母在那个院子里住了十年,从8岁到18岁。这个院子不仅是我从童年、少年向青年时代过渡的生命空间,也是我心性发育的重要载体。那院子使我逐渐喜欢上了具有北京特色的市民生活,我家门外那高大的合欢树(即马樱花树),我家后窗外仲春时几乎要把花枝伸到我床头的西府海棠,后院那需要三四个孩子才能合抱的古槐,还有分布在好几处,每到秋初全院孩子都会为收获、分配其上果实而激动的枣树、核桃树,都扎根在了我的心灵中,永不会枯萎……

住到钱粮胡同以后,我先在胡同南端的私立耀华小学插班。至少到1953年左右,那时还有很多的私营机构,从私人工厂、商店、电影院到私立学校。我家附近当时的蟾宫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,就是私营的,记得家里大人曾带我去那里看过费穆导演的,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《生死恨》,和美国好莱坞的彩色歌舞片,虽说我上学早有早慧的可能性,但那时这样的电影只能让我没看完第一本便在座位上呼呼大睡。抗美援朝以后,美国电影被驱赶了,梅兰芳等“四大名旦”的戏照唱,家里大人全是戏迷,带我看了不少京剧,以及评剧(那时叫“蹦蹦戏”),稍后又出现了一种从大鼓书等曲艺形式攒合而成的曲剧,我由此不仅知道了“四大名旦”,也知道了马连良、谭富英、裘盛戎、叶盛兰,以及新风霞、魏喜奎……

我大约从1951年起转入了隆福寺街上的公立隆福寺小学上学。隆福寺街与钱粮胡同平行,我每天上学,要来回穿过隆福寺两次,那时隆福



城市中轴线南始点——永定门